



杨海若 编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教育出版社



寻索云南最早的留学生



杨海若 编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教育出版社



寻索云南最早的留学生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寻索云南最早的留学生 / 杨海若编著. -- 昆明 :
云南教育出版社, 2012.1
(经典云南丛书)
ISBN 978-7-5415-6143-6

I. ①寻… II. ①杨… III. ①留学生 - 概况 - 云南省
- 近代 IV. ①K8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82000号

书 名	寻索云南最早的留学生
作 者	杨海若
策 划 人	李安泰 杨云宝
组 稿 人	吴学云
出 版 人	李安泰
责任编辑	杨云宝
装帧设计	向 炜
责任印制	赵宏斌 张 旸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发行
云南教育出版社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www.yneph.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云南新华印刷实业总公司一厂印刷
2012年1月第1版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720毫米×1010毫米 1/32开本 2.25印张 60千字

ISBN 978-7-5415-6143-6
定价 4.80元

总 序

云南，从渺远神秘而又带着蛮荒色彩的“彩云之南”走到今天，一步一个脚印跋涉在中华大地上。

云南山水，多娇诱人。

闻名遐迩的喀斯特地质奇观石林，奇妙无比。

迷人的高原深水湖泊抚仙湖，凝波如玉。

秘境香格里拉的高山草甸，杜鹃如火；巍峨雪山，苍茫古远。

低纬度的明永冰川，从古流到今；高黎贡山的各色鲜花，从冬开到夏。

大理的风花雪月，丽江的小桥流水，版纳的原始森林，腾冲的地热奇景，泸西的阿庐古洞，怒江的东方大峡谷，令人陶醉。

七彩云南，蕴涵的又何止是奇山美水？！

这里，有寒武纪早期生物大爆炸的典型：澄江动物化石群。这里，诞生了中国最古老的人类：元谋人。这里，曾崛起过古滇国、哀牢国、南诏国、大理国。这里，有蜀身毒道、秦五尺道、茶马古道、滇缅公路、驼峰航线。这里，有世界上唯一活着的象形文字“东巴文”。这里，出现了中国第一个海关、第一座水电站、第一条民营铁路。

这里，有与黄埔军校齐名的云南陆军讲武堂。

这里，爆发过反对清王朝统治的重九起义。

这里，在袁世凯复辟帝制时，率先通电全国，举起了护国运动的大旗。这里，举办过名垂青史的西南联大，并爆发了震惊全国的“一二·一”运动。这里，曾经涌现了杨振鸿、张文光、蔡锷、李根源、唐继尧、庾恩旸、刀安仁、杨杰、罗炳辉等一个个热血汉子；这里，也曾经孕育出书法家钱南园、医药家兰茂、数学家熊庆来、哲学家艾思奇、音乐家聂耳、诗人柯仲平、舞蹈家杨丽萍、诗书画三绝的担当大师等文化奇才。

朱德、叶剑英，在这里留下了坚实的足迹；徐霞客、杨慎，在这里留下了自己的千古绝唱。

这里还有神奇的云南白药、剔透如玉的云子、独树一帜的普洱茶。

这里的焚人悬棺、纳西古乐、摩梭走婚、白族三道茶、彝族跳菜等滇人风貌和民族风情，更是诉说不尽。

“经典云南丛书”像一根线，把散落于三迤大地的粒粒圆润闪亮的珍珠串连起来，呈现于您的眼前，让您清晰地看到云南山水奇观、人文历史和民族风俗的经典篇章，让您在愉快的阅读体验中增加知识、增长见闻、解密未知。

“经典云南丛书”为百科式解读云南的通俗性读物，融知识性、趣味性、探秘性与时代性为一体，以一种新的视角和叙述方式展现云南的独特之美，以满足人们了解云南、探秘云南、遨游云南的愿望，希望我们所做的一切已达到了。

编 者

目 录

导言 近代中国人的百年留学之路	1
一、群英荟萃的云南留日学生	9
1. 改写云南近代历史的留日学生代表——李根源、唐继尧	12
2. 中国种植橡胶第一人——刀安仁	21
3. 计算机中文编码的领头人——郑易里	24
4. 大众哲学的开创者——艾思奇	28
二、影响深远的云南留美学生	31
1. 东陆大学前三任校长——董泽、毕秀升、何瑶	33
2. 云南实业巨子——缪云台	39
3. 抢修滇缅公路艰巨路段的总指挥——段纬	42
4. 清华大学最早的共产党员——施滉	44
5. 航天科学家——王希季	47
三、人才辈出的云南留欧学生	51
1. 中国数学的一代宗师——熊庆来	52
2. 中国共产党早期优秀党员——张伯简	54
3. 东北抗日联军创建者和杰出领导人——周保中	56
4. 中国敦煌学的开拓者——姜亮夫	60
5. 云南第一位留洋女博士——施莉侠	62
四、开启中阿文化交流的序幕——云南留埃及学生	65
回族学者和翻译家——纳忠、纳训	66

导言 近代中国人的百年留学之路

近些年来，伴随着中国崛起的脚步，出国留学掀起的热浪几乎席卷了整个神州大地。大学里，为出国拿着外语单词书苦背的人举目可见；个别中学里，甚至开设了专为出国学生准备的出国班。在国内高考制度和高等教育质量不断受到质疑的今天，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出国留学能够更好地实现自我价值。可以说，在当代中国，留学的意义不仅仅是丰富个人人生阅历的重要手段，更是促进国与国之间知识的提升和文化交流，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必经之路。

在当代，出国留学之所以受到推崇和追捧，除了富起来的中国人因为对我国现行教育体制的质疑而另寻出路外，更与我国早期留学生们所取得的有目共睹的辉煌成就息息相关。综观人类历史，出国留学并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而是许多国家发展振兴的必然选择。当代中国留学的大潮虽然涌现于20世纪90年代，但从开始至今已经走过了160余年历史。百年来，负笈海外的一批批留学生为中国从积贫积弱迈向国富民强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其中的佼佼者更对中国的科学技术、经济文化和社会进步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对于满目疮痍的近代中国，留学生们在每一次社会革新中发挥的作用更是无可替代。持续不断的留学教育对中国近代史的发展演变产生了至深至大的影响，从这一点说，近代的中国留学史就是一部近代中国史，是一部中华民族不断觉醒成长并逐渐强大的心灵史。

在古代，中国的教育制度曾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除了众所周知的“唐僧取经”——到天竺学习佛理等几例故事外，外出求学的事例在数千年的文明史中鲜有人提及。泱泱华夏以“天朝上国”和“中央王国”自居，比起外出求学，更愿意接受别人的效仿和崇拜。留学生一词，即源于中国唐朝时期的中日文化交流，意为当日本的遣唐使回国后，仍然留在中国学习的日本学生。现在泛指留居国外学习或研究的学生。然而在13世纪以后，尤其是工业革命以后，欧洲人建立起了各种新式学校，教授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生产技术，培养了不同领域的大批人才。正是这些知识分子促使了欧洲工业革命发生和迅猛发展，并将中国远远地抛在了后面。直到19世纪初，夜郎自大的清朝统治者仍然沉醉在东方大国的迷梦之中，闭关锁国的政策使他们浑然不知此时的中国正逐渐衰老和腐化。尤其是在教育体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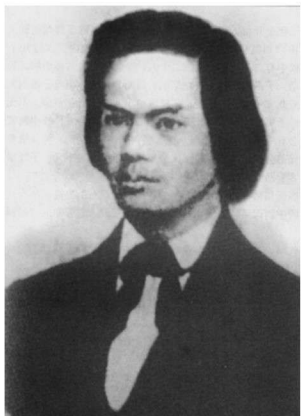


上，清朝的教育制度仍仅限于私塾教育和科举制，全面沿袭千余年的旧制并强化了传统教育的专制主义和脱离实际等落后之处，早已与现代教育格格不入。

1840年，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发动的鸦片战争，敲响了中国封建制度的丧钟，使中国社会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战争使得中西差异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教育等方面全面显现出来，这对中国的士大夫阶层乃至平民百姓都产生了强烈的震撼。

社会的激烈动荡、民族危机的急剧加深，使绝大多数的中国人，特别是统治者和知识分子不得不思考怎样救亡图存以及“中国向何处去”的重大发展问题。在战争的隆隆炮声中惊醒的有识之士，开始从民族失败的教训中寻找救国良方。作为“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开设译馆，主持编译了《华事夷言》、《四洲志》等书籍，使人们开始逐渐了解外部世界的情况。林则徐的学生魏源编辑了《海国图志》，旨在介绍西方社会和总结鸦片战争的经验教训，书中“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一经提出，在当时的中国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至于为何要“师夷”、“师夷”的内容是什么、怎样“师夷”的争论几乎贯穿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始终。

被称为“中国留学生之父”的容闳，由于出生在广东沿海这个较为开放的区域，第一次把“师夷”从理论变成了实践。他年少时就被传教士带到美国深造，于1850年考入耶鲁大学，成为“耶鲁大学中国第一毕业生”，也是近代中国第一个留学生。回国后，容闳恰逢洋务运动的浪潮，西学东渐的情况使洋务运动迫切需要一批外交人才和技术人才。因此，曾国藩、李鸿章接受容闳的建议，上奏清廷，于1872年开始分批逐年派遣了共计120名幼童赴美留学，从而拉开了中国留学教育的大幕。容闳是促使中国政府派遣成批学生出国留学的第一个倡导者和推动者，是第一位从西方盗回真



容 闳

理火种的有功人员。此前，近代中国最早的留学生大多是跟外国传教士出国或得到教会资助和引介的。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宋氏三姐妹宋蔼龄、宋庆龄、宋美龄的

父亲宋嘉澍，也是与容闳一样，被传教士带到美国留学，他后来又将自己的儿女们送到美国留学。

此后，洋务派出于加强海防的需要，促成了清廷在1877年、1878年和1885年分别派遣以福建船政学堂学生为主体的88名留学生赴英、法、德等欧洲各国学习造船、驾驶、兵技等西学。在1872年至1896年的几年间，洋务派派往美、日、法、德、英等国学习军事技术、自然科学等科目的留学生共有200余人，这实际上形成了由洋务派主持控制的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次出国留学高潮。其中学有成就的留学生回国后大多成为政界、军界、商界、学界的知名人士，或是工厂、企业、铁路、矿山的技术骨干，如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著名教育家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严复、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唐国安、“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中日甲午战争英雄邓世昌等。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天朝上国”居然败给“蕞尔小国”，给中国人以莫大刺激，老师被学生打败，使中国人一改往日鄙视日本的态度，开始以好奇、崇敬的心态重新审视自己的东亚近邻。清廷中的一部分人认识到，明治维新的成功使日本迅速崛起，成为一个经济繁荣、国力强盛的国家，维新与人才的关系十分重要。派遣留学生到日本，是学习和仿效日本的捷径。1896年，清政府派了13名留日学生，这是中国政府派往国外的又一批留学生。

同时，甲午战争一役，清王朝落败于一直没有放在眼里的日本，使中国的民族危机进一步加剧，人们不断对教育问题进行认真的反省，并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国势衰败在于人才匮乏，人才匮乏在于教育不振”之类的教育救国的思想开始萌发。至19世纪90年代后期，在变法维新运动的背景下，教育救国的思想成为一种社会思潮而广泛传播，这一潮流的领导人是康有为、严复、梁启超等人。到20世纪初，教育救国的思想已经为一般人士所认同，正所谓“甲午庚子以还，内为志士所呼号，外受列强之凌辱，始知教育为中国存亡之绝大问题，于是众口一声，曰教育教育”。

清王朝为了拯救已经危机四伏的统治，就连那些极为顽固守旧的官僚士大夫都认识到战舰之精、机器之利、格致物理、巧夺天工为西人之长技。国家要生存，就必须变法。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进一步加深了中华民族的危机。1901年1月29

日，流亡于西安的清廷发布了变法的上谕，宣布要实行“新政”，其内容涉及政治、军事、经济等各个领域。自然，教育改革成为了这次“新政”的一个重点。这次改革虽然仍有较浓的封建色彩，但它毕竟是清政府自上而下进行的一次规模最大的教育改革，更是中国“三千年一大变局”，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

首先，在这次改革中，从隋朝开始延续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于1905年被正式废除，这为新式教育的发展清除了一个最大的障碍。严复将废除科举制喻为“废封建，开阡陌”一样的千百年仅有的大事。事实上，当数百万封建学子的传统仕途被切断以后，出国留学渐成学子的共同追求。如胡适在1910年给母亲的信中所说：“现在时势，科举既停，上进之阶，唯有出洋留学一途。”

其次，大力倡导兴办学堂。在新式学堂中开设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课程，对于推动“新学”和“西学”的发展有较大好处。同时，它也是清政府承认和肯定“新学”和“西学”的一个明证。

最后，正式派遣学生到国外留学。这一举动解开了中国人心中的一大死结——“以夷为师”。当昏庸的统治者从“四夷宾服”的文化包袱中解脱出来时，“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则成了广大留学生的坚定信念。一批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甚至将“求学”视同“求药”，试图从国外寻找救民救国的良方。

在此改革的基础上，中国的留学教育发展迅速。出国留学出现了第二次高潮，而这次的留学主流之所以在日本，其原因是，近代以来，日本也一直受到西方列强的欺凌，经过明治维新后国力大增，让清廷震惊不已。一部分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急欲赴日亲自探究日本速强的原因，而清廷中的一些大员也想借鉴日本的经验，使中国的变法取得速效。由于日本学习西方颇有成效，加之客观上留学日本有着路近、费用低、文化渊源较深等便捷条件，中国对外派遣留学生开始由欧美转向日本。

对此，正如张之洞曾在其《劝学篇》中说道：“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日本路费省可以多派，距离中国近，便于管理，日本语文接近中国语文易于通晓。欧美教科书浩瀚激进，极端民主化，凡不合东方传统的日本已有所修改。中日国情风俗相近，容易效仿，且事半功倍。尤其是中国的君主立宪政体，君主

和皇室仍然大权在握，特权不减，更是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典范。”由此可见，中国大力向日本派留学生的政治目的是非常明确的。

正是抱着“远效西人，不若近法日本”的思想，自从1896年中国留学日本的大门开启后，每年留学日本的人数都呈直线上升的趋势。1901年，清政府通令全国各省迅速选派留学生，并鼓励自费留学，回国后，赏给进士、举人等出身，予以重用。所以，从这一年起，中国留学日本的人数剧增。1905年至1906年留日学生的数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一时之间竟然达到了8000人之多。1896年至1911年间，中国留日学生人数达到万人以上。1906年8月7日，清政府学部统计，中国留日学生已达1.3万余人，其中习速成者最多。日本成为当时中国留学生人数最多的国家。



值得注意的是，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流亡日本，极力争取华侨和留学生，宣传其维新变法的主张。在此之前，孙中山、陈少白、郑士良等革命派人士也因国内起义失败而流亡日本。无论是革命派还是保皇维新派，他们在日本有的本身就进入日本的各级学校成为留学生，另一方面还积极争取和发动学生，向留学生灌输各种维新或革命理论。对于留日学生的政治活动及其影响，有学者指出：“清末革命运动的成功，主要由于革命、立宪两派人士的推动与努力，他们曾唤起全国青年知识分子的觉醒，共同参与活动，推翻君权，建立民主共和。在这个过程中，留日学生的贡献尤大。因为他们提供了理想的政治思想，发展组织以及传播主张，使海外的涓滴汇成国内的洪流。”辛亥革命的领导者中很多都是留日学生，如黄兴、胡汉民、陈天华、秋瑾、蔡元培、吴玉章，留日学生成为辛亥革命主力军。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和中坚也多为留日学生，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郭沫若等。另外还有曾任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等军事人才。

为了留学生的学历考核有章可循，1904年5月13日，清廷批准实行《考验出洋毕业学生章程》。该章程由学部拟定，共八条，这是清政府拟定的第一个考核归国留学生学历的章程。

民国初年，庚款留美成为了热点。这要追溯到1900年（庚子年）八国联军侵华，清政府战败后与八国签订《辛丑条约》，被迫对各国偿付巨额赔款。美国作为最早接受中国留学生的国家，在清末吸引中国留学生的过程中不甘落后于日本，试图以庚子赔款来争取新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因此，1908年，美国为了其

在华的长远利益，正式通过国会议案，将庚子赔款过多计算的部分退还中国，作为中国派遣留学生赴美学习的专款。美国退还庚款余额的行为带动了其他国家也纷纷退还庚款余额，吸引中国留学生，参与对中国文化精英的争夺。这就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影响极大的庚款留学运动，这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学界的留学运动。

庚款留美从1909年开始，清廷考选留美学生47名，其后两年相继派遣70名和63名。为此，1911年清廷还专门成立了一所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学堂，招考品学兼优的中学毕业生作为留美预科生，全部实行公费教育。因此，在庚款留美的影响和推动下，以清华学堂的学生为主体的赴美留学热潮在清末民初形成。由于选拔要求严，起点高，而且待遇较丰厚，因而留美学生大多专心求学，获得高学位的人很多。这一时期回国后的留美学生不但促进了中国留学教育和国内高等教育及科研水平的提高，同时也成为中国近现代科学、教育的中坚力量，如著名学者胡适、气象学家竺可桢、语言学家赵元任、哲学家冯友兰等。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中国青年在新文化运动和反帝爱国思想的影响下，大批奔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劳工奇缺的法国，开展勤工俭学运动。从规模上看，这次留法活动自1919年第一批89名学生赴法到1921年104名学生被遣返回国，前后历时两年零八个月。期间派出学生20批，共1600多名青年，远涉重洋，掀起前所未有的由民间组织自行发起，学生自费的大规模留学运动。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在赵世炎、张申府、周恩来、蔡和森、聂荣臻、陈毅、陈延年、陈乔平、向警予、蔡畅、邓小平、张伯简等积极努力下，旅欧的党团组织建立和进行了广泛的宣传组织工作，开展了革命斗争，它的性质和内容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大批青年在斗争实践中走上与劳动群众相结合的革命道路，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克服工读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接受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成长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五四”运动时期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教育发展史上，都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严济慈、童第周、巴金、徐悲鸿、钱三强、肖三、冼星海等著名科学家、艺术家、文学家、音乐家也随此潮在法国学习过。

与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相承接的是20年代的留学苏联，这主要是三个方面的因素促成的。第一，1917年的十月革命成功后，苏联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成为中国人效仿的对象。第二，中共旅欧支部为了培养干部、推动国内革命运动的发

展，在1923年开始从当地选派一批勤工俭学的留学生和华工青年去苏联学习。第三，孙中山在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中注意到苏联在短期内“自立于强国之林”的成功经验，遂产生了改组国民党和中国革命要“以俄为师”的想法。因此，中国历史上留苏学习的高潮便产生了。

这一时期的苏联聚集了一大批中国青年之精英，这些学生后来绝大部分成为优秀的革命家、文学家、艺术家和科学家。未来的中国政界要员也在这里频频亮相，从苏联归国的骄子，陆续成为国共两大政党的风云人物，比如曾任国共两党要职的张闻天、朱德、刘伯承、邓小平、杨尚昆、王明、博古和蒋经国等人。

20世纪30年代，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出于对日本侵略者的愤慨和对欧美先进科技文化知识的向往，赴日留学又逐渐被赴欧美留学所取代。但是，由于国破家亡，抗日期间，出国留学人数锐减，1938—1941年全国仅有300人左右出国留学。抗战胜利后，全国上下渴望加速国家工业化和科学技术进程，激励了新的留学潮，当时政府制定《自费留学生派遣办法》，为大批学生到西方学习创造了有利条件。在赴欧美求学的精英人才中，产生了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在中国科学发展史上作出了重大贡献的朱光亚、唐敖庆、赵忠尧等杰出科学家，以及文化大师季羡林等人。

建国初，据高教部统计，1950年滞留各国的中国留学生和学者有5000多人。其中美国3500人，日本1200人，英国443人，法国197人，德国50人，丹麦和加拿大各20人。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封锁，我国被迫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我国大批留学生奔赴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求学，全面学习苏联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作出巨大的贡献。20世纪60年代，中苏交恶，我国几乎与世隔绝，出国留学几近绝迹。1978年底，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出国留学大门重新开启，出国留学逐渐成为一个潮流，吸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此行列。

在回顾近代中国百年留学史后，我们不难发现，留学生在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首先，留学生是西方先进科学知识、生产技术和政治思想的传播者。其所学既包括枪炮、水雷、驾驶、制造理法、化学、矿务等自然科学知识，又包括万国公法、外语、哲学等社会科学内容。随着留学生学成归国，其



所学之西学也被带回国内，影响着国人。他们引进了西方现代科学，并成为中国各类学科的奠基者和创立者，留学生也因而承担了西学东渐的历史使命。其次，留学生还是中国早期现代化建设的积极参与者。留学生归国后，往往成为某一方面的专业人才，并能独当一面。他们有的成为坐镇指挥、统领军队的军事人才；有的成为制造机器、建造铁路的专家能人；有的成为传播西方政治学术思想、著书立说、开启民智的思想先驱，对中国推进现代化进程有着卓越的贡献。更引人注目的是，留学生还成为近代中国社会制度的变革者和引领者。近代中国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使包括留学生在内的国人感到切肤之痛，他们认识到仅仅学习西方先进的器物并不能给中国带来富强，必须进行制度层面的变革。这些亲历了不同社会制度的弄潮儿们用自己的思想成果或实际行动，救亡图存于风雨飘摇的祖国，并为“中国究竟往何处去”作了有益的尝试，使符合中国的正确道路越来越清晰明朗。

百年中国留学史就是一部百年中国近代史，百年海归的命运始终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扣在一起。从1847年中国留学先驱容闳踏上美利坚国土的那一刻起，一代代留学生怀着救亡图存的强烈使命感走出国门，向西方寻求救国的真理，学习先进的科技和理念，给老态龙钟的中华帝国，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改变着中国的历史命运。

综观百年留学，不同的时代带有不同的时代特色。但是爱国、争取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却是始终不变的主题。百年留学涌现出无数的爱国志士，无可辩驳地成为一支“新兴而特殊的先导力量”，在近代社会各个领域，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作出了积极贡献，为中华民族复兴发挥了巨大作用。

今日中国，已屹立于世界大国之林。但我们仍要更清醒地牢记我们离世界先进国家仍有很大距离。振兴中华的道路依然漫长，我们不能沉醉在已取得的成就之中，在逐步恢复民族自信心的同时，我们依然必须踏踏实实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

新的时代在呼唤着新一代的中国留学生，而新一代的中国留学生也必定会在这个崭新的时代留下他们不可磨灭的印记。

近代中国的留学情况如此，地处西南边陲的云南又有什么样的留学情况呢？这个曾经被视为遥远的蛮荒之地的省份，何以在近代中国史上频频出现闪光点？这个现象与云南早期的留学生有多大的联系？本书将通过分析云南早期的留学生状况和寻索著名的留学人物——解答这些问题。

一、群英荟萃的云南留日学生

19世纪中期以后，云南地处英、法侵略中国的前沿，这迫使云南各族人民纷纷谋救国之策。此外，由于人才匮乏、经济文化落后，云南受法国殖民者的刺激尤甚，迫切要求改变落后状况。但此时云南当地的教育无法培养出新时代所需人才，派遣留学生出国就成为当务之急。

1896年中国留学日本的大门开启时，滇东北的第一个留学生刘盛堂东渡日本，学习邻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借以改变家乡贫困落后的面貌。他的举动得到云南当局的首肯。在第二次全国留学浪潮和1901年清廷“新政”的影响下，最早一批云南学生出国留学是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这年云南当局选派了钱良骏等10名学生到日本留学。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又送去郭有濬等10名。光绪三十年（1904年），云南当局加大了留学教育的力度，选送速成师范41名，陆军28名，实业20名。其中学习陆军，入振武学习者有杨振鸿、李根源、顾品珍、唐继尧、李鸿祥、谢汝翼、刘祖武等；学师范、政法的有张儒澜、顾视高、吴琨、秦光玉、周钟岳、钱用中等。同年，清廷还派遣经济特科第一名袁嘉谷和刚从日本学成归来的刘盛堂一道赴日本考察学务。同时，为了较好地管理云南籍上百名留日学生，袁嘉谷被聘为云南留日学生监督。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云南派陈荣昌赴日本考察学务，又添派12人到日本留学。至1911年止，官派留学持续了10年。从规模上看，派遣了至少229人的留学生。自费留学者也日渐踊跃，到宣统末年达数百人。到了民国时期，留日的热潮并没有消退。1931年前，云南每年派日的公费留学名额到达30名，其中包含5名女性，甚至有的已婚女子也赴日留学。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留日学生悉数罢学返乡，以示抗议，云南留日学务暂时结束。虽然此后逐渐恢复，但留学教育的热点、重点逐渐向欧美转移。



从留学专业上看，晚清时期留日学生留学方向主要集中在军事方面，他们所取得的成就最为显著。据史料记载，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的留学生中有中国学生199人，而其中云南籍的学生就有22人，占了九分之一。当时的云南笼罩在英、法妄图侵略和殖民的阴影之下，大部分留学生认为学习军事是让家乡摆脱灾难最有效的方法。在日本学习军事的除李根源、唐继尧等人在推翻封建统治的斗争中取得辉煌成就外，还有一个被称之为军事学家的杨杰，他在日本陆军大学毕业时成绩名列第一，回国后，曾先后担任国民政府驻苏联大使、陆军大学校长。而民国以后，留学方向则以文科、实业为主。

从留学生籍贯来看，以1904年的129名云南留日学生为例分析，他们的籍贯分布在全省各地，以云南（辖今昆明、安宁、禄丰、易门、晋宁、宜良、嵩明等县市）、大理、澄江、昭通、普洱5府居多，还有一些来自于少数民族聚居地；年龄最小的17岁，最大的62岁，其余大多集中在20—40岁之间；在已知的111人中，无一例外均受过正规的儒学教育，参加过科举并获得功名；他们“或习师范，或习法政，或习陆军，多以救国自任”。

辛亥革命后，1913年，中央政府恢复选送留日学生，云南考送40名预备科学生赴日公费留学。1926年，云南省政府制订《留日学生管理办法》，规定每年向日本派出公费留学生14名，后又分别增至20名、25名，1931年增至30名（含5名女生），除官费生外，还有大量的自费生。这一阶段，云南学生赴日本学习的学科主要为经济、师范、文学、法律、冶金、医学、制造等，主要学校为东京帝国大学、京都帝国大学、东京高师、东京高工、大阪高工、京都医专、长崎医专、日本大学、明治大学等。从1912年至1948年，云南共向国外派出留学生284名，其中留日生141人，留美生87人，余则为留学欧洲、安南（越南）、缅甸、菲律宾、印度、埃及和香港等地的学生。总的来说，在整个云南近代留学史上，特别是在“九一八”事变前，日本是云南留学生最主要的目的地，这与当时中国的留学主流是符合的。留日学生对近代云南乃至近代中国的深远影响，为去其他国家



的留学生所不及。

从政治方面来看，自1911年辛亥革命至1927年的17年中，云南一直处在留日学生蔡锷和唐继尧的治理之下，实施了一系列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政治改革措施。以留日学生李根源为校长的云南陆军讲武堂，在近代中国的军事教育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培养了大批军事人才，纵横驰骋于西南地区的政治、军事舞台。以留日学生及云南讲武堂学生为领导骨干建立起来的滇军，更是声名鹊起，在云南“重九起义”及后来的“援川”、“援黔”、“援藏”、护国战争、护法战争和抗日战争等事件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正是因为留日学生的影响，地处西南边陲的云南曾以“新学”著称，不但有完善的新式军校教育、有自给自足的现代兵工厂，还有令人耳目一新的市政建设。军政府还编制了云南省五年政治大纲，这是云南省有史以来可考的第一个官方制订的全省五年建设计划，有力地促进了云南经济社会的发展。可以说，在“重九起义”、护国战争、抗日战争等历史性节点上，留日学生不但成了清王朝的掘墓人之一，更是护国讨袁，护卫共和的功臣。



从文化方面来看，这些留学生成了云南新式教育的拓荒者，对发展云南的文化、教育、科学事业起到了积极作用。云南留日学生本着“学习办法、教法及诸科学之大要”的目的，在回滇后，不少人成了省州县教育局的首脑人物。云南大中学校的教师中也有不少是留日学生。此外，像周钟岳、秦光玉、王灿等人在云南近代文化史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而像艾思奇、郑易里等留日学生中的佼佼者，更是凭借自己努力，为中国的思想、科技进步立下汗马功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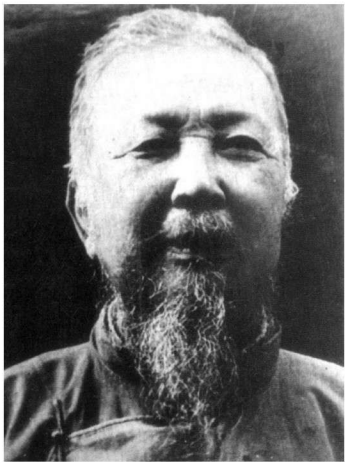
从经济方面来看，云南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与留日学生密不可分。留日学生为云南近代企业的创立提供了必要的人才和技术基础，例如刀安仁引进橡胶，又从日本带回了专家和机械。唐继尧等人则利用政权的力量，大力发展云南地方实业和文化事业，使云南经济社会逐渐走向现代化，对近代云南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1. 改写云南近代历史的留日学生代表——李根源、唐继尧

云南，这个位于中国版图边疆的省份，一直在中国历史上扮演着安居边隅的角色。她的历史，如同一条静静流淌的长河，偶尔丢进一块石子，溅起一点水花，旋即又归于平静。自吴三桂云南起兵反清之后，云南再无大的战事，虽然偶尔会有回民或苗民等少数民族的起义，但是规模都很小，像一颗颗细小的沙砾，在长河里兴不起大的风浪。

这条长河，就这样平静地流淌到了上个世纪初叶的那个多事之秋，直到两块巨石投入到了这条静静的长河之中，才掀起了滔天巨浪。这两块巨石，一块是1911年的“重九起义”，一块是1915年的护国运动。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与云南早期留日学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其中的代表人物便是李根源和唐继尧。历史将他们和与他们一起在日本学习军事的云南留学生们一起推到了舞台的前沿，成为了中国近代历史舞台上叱咤风云的领军人物。

清光绪五年（1879年）6月6日，李根源出生在云南腾越南甸（今腾冲梁河县）九保镇的一个书香世家，祖籍山东青州。在“学问宜恒，立身宜正，做事宜诚”和“浑厚斯得福，横暴必遭灾”的家训教诲下，李根源从小就养成了一种正直、倔强、执着的处世观。李根源成长的少年时代，正是中国边疆危机极端严重的时刻。此时，法国已经并吞了越南，而英国占领了缅甸，英法下一步的侵略矛头直接指向了云南，直接与缅甸为邻的腾越深受其害。少年时期的李根源亲眼见证了英法的



李根源